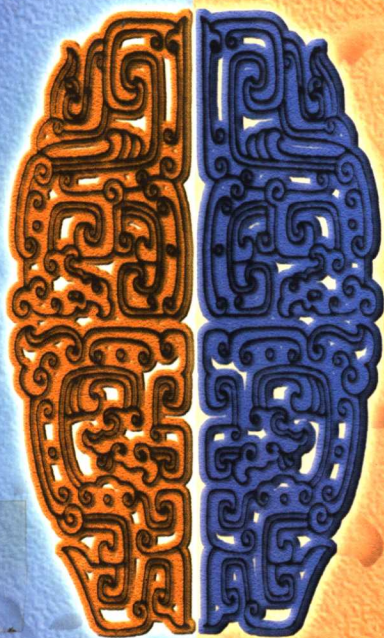


变异与保持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

曹云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变异与保持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

曹云华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曹云华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4

ISBN-7-80120-513-8

I. 变... II. 曹... III. 华人—文化—研究—东南亚
IV. D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813 号

● **变异与保持**

——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

著 者/曹云华

责任编辑/凌玮清

装帧设计/李志国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32 千

印 刷/北京永生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20-513-8/Z·48

定 价/21.5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安定路 20 号院 邮编 100029

E-mail: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本书由暨南大学 211 工程资助出版

绪 论

I. 研究现状、意义、拟突破的范围

一位叫赫伯特 S. 伊的学者曾经对 80 年代的中国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状况进行一次总结，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课题领域的局限性。主要侧重于华文教育、华侨华人文化、华工移民史、著名华侨传记和华侨华人社团等传统的研究课题。“目前有关东南亚华侨的课题结构，远远不能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与日俱增的联系的需要。一些更值得注意的课题领域如中国的华侨政策和华侨与原住民的关系等，并没有真正得到加强。尤为重要的是，华侨研究还有不少重要的空白。几乎没有一位中国学者从事华侨的心态、社会行为和政治参与、华侨妇女以及总人口的研究。”^[1]

二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限制。中国学者研究东南亚华人问题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它们分割成一块块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如华人历史、华人经济、华人社会、华人政治、华人文化及国别华人（如马来西亚华人、印度尼西亚华人）等等。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也几十年一贯制，基本上沿用以前的阶级分析法，历

史学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传统的历史法是中国学者在东南亚研究中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有一些明显的优点，如强调历史证据以及材料和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使用通俗而严谨的语言，注重事件的连续性以及课题领域论述的全面性等等。但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例如，传统的历史研究法在研究事件或政策的由来和后果时使用直线的因果思维模式。多数华侨研究文章落入‘原因——过程——结果’直线模式的窠臼。很少就因果的互换性和因果之间的内部结构和全面关系进行研究。而且，把材料归入各个具体的课题领域和按年月顺序叙述事件的趋势，终归是记述工作，而不是理论工作。”^[2]

此外，中国的华侨华人问题研究学者仍然比较喜欢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虽然已经引进了定量分析法，但却很少使用，“定性分析仍然是华侨研究中的主流”。“反映在我们所收集的东南亚华侨研究文章中定性分析的问题，在于其笼统概括、灵活解释和含糊不清的结论。所得出的结论往往缺少明晰、系统的或确凿可靠的经验证据。更不尽如人意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是下结论于先，而后再找一些孤立和琐碎的证据来加以证实。”^[3]

三是政府管理政策的限制。长期以来形成的许多习惯性思维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划定了许多研究的敏感领域，研究人员一般不能也不太愿意进入这些“雷区”，否则就有触雷的危险。“目前，多数政府部门在制订政策之前是不找研究机构的专家们商量的。有的时候他们还要求学者写文章支持政府现行的政策。奇怪的是，一些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乐意满足这种要求，从而写出一些没有多少科学或实际价值的、仅仅对政府政策起说明或‘注释’作用的文章。”^[4]

此外，还有图书资料的限制、学术交流和合作的限制、科研人员短缺的限制、出版的限制、缺少科研经费等等。

从 90 年代至今,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新人加入到了华侨华人的研究队伍,不仅充实了力量,还带进了许多新鲜空气,使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队伍出现了质的变化,总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些新人多数具有硕士学位,知识结构合理,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而且有较高的外语水平。此外,年轻的研究人员也比较注意学习国外的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运用一些新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去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尤其注意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在研究领域方面也得到了拓展,比较注重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一些研究空白得到填补,一些研究禁区也被打破。出现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成果,例如,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衍德先生的专著《现代中的传统》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他运用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菲律宾华人社会和家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颇有启迪意义。

然而,上文曾经提到的赫伯特 S. 伊对中国 80 年代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存在的各种局限性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问题甚至更为突出了,例如,研究人员知识更新的问题,在当今信息时代,知识更新的频率大大加快,许多研究人员的素质明显不适应这种变化,正如赫伯特 S. 伊所说的:“在所有从事华侨研究的主要研究所中,历史研究人员满为患,而从事社会学、教育和法律研究的科研人员则很短缺。研究人员通常不愿对华侨问题做多学科探讨。多数人宁愿从本学科狭隘的角度进行课题研究。此外,尽管现代科学的信息和理论在迅速变化,但一些科研人员并不急于使自己的学科知识现代化。”^[5]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学科建设方面长期得不到重视。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华侨华人研究看作是阐释政府政策的工具,而不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因此,这个领域的所有学者应该共同努力,把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建设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只有如此,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才会有光明的

前途。

本书试图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一些突破，运用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诸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来研究东南亚华人问题，对东南亚华人问题进行立体的、综合的、交叉的透视。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一直比较少涉及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①的关系这个研究领域，有人曾经专门做过统计，在整个80年代，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只有14篇，而且主要散见于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论文中。^[6]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这个领域有较高的敏感度，学者们一般不愿意介入；二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而中国的研究人员既缺乏资金，也很难有机会出国。

在国外和中国台湾地区，许多华人问题学者较早就开展了对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如同化与融合问题、华人参政问题、华人家庭问题等等，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论著有：廖建裕的《现阶段的印度尼西亚华族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政治思想》（英文版）、《作为东南亚人的华人》（英文版），颜清煌的《新马华人社会》，王庚武的《东南亚与华人》，陈烈甫的《菲律宾的民族文化与华侨同化问题》，陈守国的《华人混血儿与菲律宾民族的形成》，李亦园、文崇一和施振民合著的《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上下册），古鸿廷、崔贵强合著的《东南亚华人问题》等。这些著作对本课题的构思和研究起到了

^① 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执政时期曾经把当地民族叫作原住民，华人与其他外来民族被叫作非原住民，我国的一些学者也习惯于把东南亚的当地民族叫作原住民。这种叫法并不太准确。在马来西亚，原住民是指居住于偏僻山地的少数民族。此外，华人已经长期在东南亚各国定居和生活，把他们叫作非原住民，显然有失公允。因此，本书一律不使用原住民的提法，只使用当地民族一词，在有些场合则提当地主流社会，也是同一个意思。

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国内，对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多，但也有一些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较早开展这类问题研究的学者有陈碧笙、周南京、梁英明等教授，作者从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许多启迪，尤其是陈碧笙教授的题为“华人与东南亚各族关系的探讨”的论文（全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三次研讨会论文，1986年，北京），对华人与东南亚各民族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前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使作者获益良多。

近年来，我国中青年华侨华人研究工作者开始重视海外学者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经验与方法，注意借鉴和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文寿主编的《华侨华人新论》一书，该书汇集了近年来海外学者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有多篇关于海外华人同化问题的论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在研究方法和视野方面相当有新意。例如，居维宁所著的“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一文，^①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分析海外华人的种族认同问题，使笔者深受启发。此外，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工作者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名著，也对作者完成本课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马戎主编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使作者在研究方法方面深受教益。

本书以战后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涉及的范围很广，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本书打算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切入，研究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之间是怎样在各方面互相做出调整与相互适应的。以

^① 这里所说的种族，实际上相当于国内学者使用的民族。在海外，种族一词的使用相当广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民族一词混同使用的，两个名词没有多大的差别。在中国，种族与民族是有很大差别的，种族是生物学方面的概念，指人种；民族是社会学方面的概念，指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也采用海外学者的提法。

文化适应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切入点，有如下两个重要意义：

1. 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研究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新的尝试，可以弥补这个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不足。本课题的主要学术价值，是试图在研究内容方面有所突破，从文化的角度对华人与东南亚各民族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探讨，这是一个新的角度和新的视点，力求为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研究华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把它放到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去进行分析和探讨，这样才能有理论的深度和广度。

2.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课题的应用价值在于，它可以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侨务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维。如何处理好华侨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关系一直是我国侨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本课题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

II. 关于文化适应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的差异是当代世界许多冲突与战争的最深刻的根源，在后冷战时代更是如此，各种文明（准确地说，亨廷顿这里说的“文明”应该是“文化”）之间的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全球的各种政治力量正在根据文化的差异而重新分化与组合，“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7]亨廷顿还认为，东南亚的华人将会因为

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无法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8]

笔者认为，亨廷顿的观点是错误的。首先，在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某些国家的某个历史时期的确曾经发生过许多排华事件，民族关系相当紧张，甚至发生过暴力冲突，但造成紧张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原因。其次，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确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正是这种差异性促进了东南亚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使它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再次，华人是能够适应环境的一个民族，为了在东南亚这块土地上生存与发展，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对自己的文化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民族的文化，在一些国家，例如泰国和缅甸，华人及其后裔甚至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已经很难分清谁是华人，谁是当地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不是造成民族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的必然因素。

但是，亨廷顿的理论也有合理的一面，文化差异性，如果处理得不好，尤其是如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挑拨离间和利用，它的确会在各民族之间造成一些误会甚至产生冲突，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民族关系，往往能够解答用其他方法无法解答的问题。

战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各国一直存在华人问题，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战后东南亚华人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关系问题。即成为国家主人和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的当地主体民族对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华人实行歧视政策，华人受到各种不公正的对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民族关系说到底还是阶级关系，但是，在东南亚国家，仅仅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恐怕很难对错综复

杂的华人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课题试图跳出传统的框框，用一种新的模式，对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做一些分析，即从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种关系。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矛盾，有很多表现形式，如雇主与雇工的矛盾，富人与穷人的矛盾，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工商业与农业的矛盾，等等。文化差异性有时候会加剧这些矛盾和冲突，尤其是当各族之间的认同发生分歧时，更是如此。“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9]

长期以来，东南亚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对东南亚当地主体民族的文化，既有适应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适应的一面，表现为华人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同舟共济，共同促进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不适应的一面，处理得不好，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酿成各种矛盾和冲突。

陈碧笙将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史分为如下三个时期：从12世纪初叶华人出国到16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东来为第一时期，前后约400年。这个时期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关系“是十分和谐而友好的”。从16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东来到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退出为第二时期，前后又约400年。由于西方殖民者对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给两者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恶果”，“阻碍了华人与土著民族正常关系的发展”，“在制度上使华人社会孤立于当地人民之外”。从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退出到现在为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双方关系有好有坏，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有非常大的差别，“一切正在开始”，“正处在急剧变动之中”。^[10]

陈碧笙教授的划分方法，主要以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存在

和退出为依据，诚然，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及其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给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关系带来的消极作用与后果极其严重而且深远，直到今天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笔者认为，陈碧笙教授的划分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忽视了这种民族关系中的主体，即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生存环境的发展与变化，正是这些才是影响双方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以华人和东南亚当地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为主要依据来划分双方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据此，可以把它划分为如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古代直到 19 世纪中期华人大批移居东南亚各国之前。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两个民族的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好的，尽管在西方殖民统治期间曾经发生过许多严重的排华事件，但这些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不是当地民族，而是西方殖民统治者。

第二个时期，19 世纪末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期，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且日益高涨，但是，这个时期东南亚各国的统治阶级仍然是殖民统治者，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都是被压迫者，两者之间虽然已经产生了许多纠纷与磨擦，但尚未发生直接的大规模的冲突。

第三个时期，从战后初期至目前。这个时期的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处于一种互相磨合的阶段，双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双方都在学习适应这一变化，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目前，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这种关系已经进入成熟和稳定的状态，双方已经逐渐学会适应对方，容忍对方，接受对方。但在少数一些国家，这种关系目前仍然处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第三个时期的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也

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初期至 70 年代初期），可以把这个阶段叫作动荡与磨合期。这个阶段的东南亚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不定，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也经历了许多曲折。这个阶段的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的发展演变主要是围绕如下三个问题而展开的：华人的公民权问题，华文教育问题和华人的经济活动。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恶化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东道国政府制订一系列政策，旨在使华人完全同化或融合于本地社会。华人社会在这个阶段经历了重大转变。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最终以东南亚各国大多数华人加入当地国籍和融合于当地社会而逐渐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70 年代中期至冷战结束），可以把这个阶段叫作基本适应期。在这个阶段，除了柬埔寨和越南还出现过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外，其余东南亚国家的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基本趋于稳定，双方都学会了容忍和适应对方。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之后），可以把这个阶段叫作成熟与巩固期。除了印度尼西亚还经常出现一些排华事件外，其余国家的华人都已经学会适应东南亚的环境，在所在国生根开花结果。这个阶段的华人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战后出生的华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华人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父辈——老一辈华人（大多数是中国去的移民）慢慢地从华人社会的大舞台中淡出。华人社会的这种变化赋予这个时期的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新的特点。

本课题以第三个时期的华人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尤其是在解剖两种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演变时。

把东南亚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力求揭示其共同特征及其与东

道国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艰难的尝试。东南亚各国国情千差万别，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华人也表现出非常的多元化，但是，他们又具有许多的共性，本课题就是试图揭示这些共性。当然，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离不开分析个性。

适应异国生活环境，不论是早期的华人移民还是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裔，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他们必须接触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本地文化，^① 他们面对一个如何适应当地文化的问题。同样，对于东南亚当地民族而言，也必须面对华人，面对和适应中华文化。这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接触和碰撞，民族学、人类学把这种现象叫文化适应。

什么是文化适应？

印度尼西亚华人作家黄东平在他的小说《七洲洋外》中这样描述新到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他们已经逐渐学会了华侨的生活习惯：清晨一醒来，天才蒙蒙亮，爬下床，尽管脚步还有点踉跄，自自然然会把浴巾往肩上一甩，向浴室走去。往头顶上连续淋了几勺冷水之后，脑子才真正清醒过来；听见沙沙的水声落在海面上，心坎里也分外舒畅。要是没上‘这一课’，整天像睡眠不足那么昏沉沉，浑身没有劲。”^[11] 这里描写的新到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在生活习惯上适应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气候，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洗澡，其实就是文化适应，是低层次的文化适应。

① 文化一词，人们使用得最多，概念也最为模糊不清。有人认为，文化的定义至少也有 160 种之多。一般而言，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的角度看，它仅指精神生活领域；从广义的角度看，它包含了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说的：“文化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上所学得的复合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这里说的文化及本书其他地方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均为广义方面的概念。

文化适应，在英语中叫 Acculturation，是指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和模式的过程。换一句话说，就是一族的文化在另一族（通常是邻近的一族）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文化适应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民族学家（族体心理学派）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拉尔夫·林顿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等人于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当时，他们起草和发表了《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第一次对文化适应的概念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解释：“文化适应是指一些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体集团发生长期而直接的联系，因而一个或两个集团改变了原来的文化模式所产生的现象。”^[12]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存在，都必须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和交往，而联系和交往就会产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文化适应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两个邻族可以互相影响，吸取邻族的一些什么，或者发生一些什么变化。一般的情况下，是文化较发达的族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一些。例如，西方文化传到中国之后，一方面是西方文化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化要适应西方文化。同样的，中国的移民把中华文化带到东南亚之后，与当地文化相互接触和碰撞，便产生了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中华文化要适应东南亚本地文化，而东南亚本地文化也要适应中华文化。文化适应是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文化会失去原来的一些特质，获得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文化适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学习和扬弃的过程，也是产生新文化和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美国文化源自英国，受英国的影响，但是，美国文化已经不是英国文化，而是美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工作中适应美国的特殊国情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美国文化。美国文化具有与英国文化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就连英语也有很大差别，即一种是美式英语，另一种是英

式英语。“如果我们从整个文化体系来考察就会发现，文化适应是一个建立新的文化模式的过程。当一些新的文化特质纳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现存制度及其功能体系时，文化适应实际上是一种建立新文化体系的问题，它不仅存在风俗、信仰、制度等等的再解释，而且存在着目标与价值、行为与规范的再取向。……自然，文化适应并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还有政治、经济等等的因素。当文化影响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时，文化适应问题尤其显得突出。”^[13]

当两种文化在接触和碰撞时，双方各自都必须进行调整和适应。如果双方都愿意做出调整和适应，两个民族之间就能够互相学习，和睦相处，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发生民族同化、或融合等现象；如果双方都不愿意做出改变，都对对方的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时，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一些美国学者把文化适应看作是同化的同义词，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例如，阿诺德·罗斯将文化适应定义为：“一个人或群体采纳另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或者是导向这种采纳行为的过程。”他对同化的解释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另一个社会群体文化的采纳。这种采纳程度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没有任何特征可以把这个人或群体与其原先文化联系起来，对其原来的文化也不再有任何特别的忠诚。导向这种采纳的过程即是同化。”^[14]

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则认为，文化适应是同化的一个阶段，但不一定必然导致同化。米尔顿·M·戈登在《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把同化分解为七个阶段或叫亚过程（表1）。